

宁波市甬商研究基地—浙江万里学院

甬·商·研·究·丛·书

丛书主编 应 敏

Study of Comparing the Culture of Ningbo merehants,
Anhui merehants and Shanxi merehants

甬商、徽商、晋商文化 比较研究

■ 张实龙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宁波市甬商研究基地—浙江万里学院

甬商研究丛书

丛书主编 应敏

甬商、徽商、晋商文化比较研究

Study of Comparing the Culture of Ningbo merehants,
Anhui merehants and Shanxi merehants

张实龙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甬商、徽商、晋商文化比较研究 / 张实龙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7

ISBN 978-7-308-06925-0

I. 甬... II. 张... III. 商业经营一对比研究—宁波市、
安徽省、山西省—明清时代 IV. F729.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21812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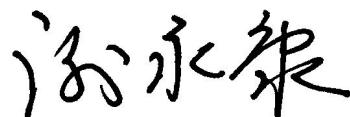
甬商、徽商、晋商文化比较研究
张实龙 著

责任编辑 杜希武
封面设计 刘依群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28)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求是图文排版有限公司
印 刷 德清县第二印刷厂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1
字 数 200 千
版 印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06925-0
定 价 29.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88925591

例与数据,剖析民营企业的成长机制、经营管理、文化内涵等,挖掘民营企业成功的内在成因,找出阻碍民营企业发展壮大的瓶颈,提出提升民营企业核心竞争力的路径,为宁波民营企业发展战略提供参考,为政府制定民营企业发展政策提供理论依据。这两个研究方向相辅相成,共同构建了一个科学的分析框架和理论体系,诠释了宁波民营企业崛起的现象,体现了历史与现实的统一,体现了甬商精神与民营企业成长的统一。总之,这是一套比较系统的总结甬商形成、发展、创新的力作,为进一步研究甬商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也为民营企业的健康成长提供了有益借鉴。

《甬商研究丛书》的出版,是宁波甬商研究基地的同仁们潜心研究交出的一份答卷,它为我们系统研究甬商开了个好头。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各界有志之士的共同努力下,我们的甬商研究必将不断深化,必将结出累累硕果。



2009年7月18日

(谢永康,现任宁波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宁波市社会科学院院长,研究员。)

目 录

第一章 引 言.....	1
--------------	---

下篇 商帮文化“外围”之探讨

第五章 甬商、徽商、晋商地理环境因素分析	87
第一节 甬商地理环境因素分析	88
第二节 徽商地理环境因素分析	90
第三节 晋商地理环境因素分析	94
第四节 本章小结	98
第六章 甬商、徽商、晋商民俗环境因素分析	101
第一节 甬商的民俗环境因素分析	102
第二节 徽商的民俗环境因素分析	105
第三节 晋商的民俗环境因素分析	114
第四节 本章小结	120
第七章 甬商、徽商、晋商的政治环境因素分析	122
第一节 甬商的政治环境因素分析	123
第二节 徽商的政治环境因素分析	127
第三节 晋商的政治环境因素分析	133
第四节 本章小结	137
第八章 甬商、徽商、晋商的学术环境因素分析	140
第一节 甬商的学术环境因素分析	141
第二节 徽商的学术环境因素分析	147
第三节 晋商的学术环境因素分析	152
第四节 本章小结	159
第九章 结语	162
主要参考文献	165
后记	166

第一章 引言

近代这一时段中的甬商、徽商、晋商。三大商帮处在大致相当的时段内，他们遭遇了同样的社会问题，却做出了不同的商业选择，形成了不同的商帮文化，承受了不同的历史命运。三大商帮文化有同有异，在此基础上，比较研究才有可能获得成功。如果将现代甬商与明清时期的徽商、晋商作比较，那就没有什么可比性而言。

其次，“甬商”、“徽商”、“晋商”三个概念具有地域性。商业本身有很强的流动性，这就决定着商人的生存空间在不停地轮转换位。例如，出生于宁波的商人可能会长期住在上海，在徽州长大的商人也可能会在扬州经商，从山西走出来的商人可能会奔走在包头的街上。但是不管商人生存空间如何变化，从原生地所带来的文化深深地烙印在他们的生命之中，流淌在他们的血液之中，并始终在他们的商业经营中发挥着巨大作用。我们研究商帮文化，应以商人的原生地作为判定研究对象的标准。

确定了研究对象以后，接下来需要交代我们比较研究的理论基础。我们将运用系统理论来比较三大商帮文化。已有的商帮文化比较研究，多是感发式的零星的比较，缺乏系统性。例如一本议论徽商的书，提到徽商重视教育的时候，便将晋商轻视读书拉来作反衬。这种抓住某些文化表征而进行的比较，所能得到的只能是表面化的结论。其实，任何一种商帮文化都是一个文化系统。

首先，这个系统具有多层次性。众所周知，文化一般分为三个层面：物质层面、制度层面和价值层面。明清时期的商帮文化大约也有这样的三个层面。商人的言语和行为都已物化在历史文献当中，都已凝结在商帮会馆等文物当中，这些文献和文物明白地标识着商人经商的领域和地域、经商的方式和方法等，这些都是物质层面的东西，是我们研读文献资料时所要接触的东西，也是最表层的东西。商人中间存在着一些制度，有些制度是国家的法令和政府的政策，商人不得不遵守；有些制度是行业规范和商帮制度，是商人们为了更好地获利，自己制订出来的；还有些非正式的制度，是一些民俗习惯和行业潜规则，虽没有明文告示，但商人们在不知不觉中遵守。商人们还有自己的价值观，他们需要对市场对社会对人生作出自己的价值判断，并依据自己的判断而做出相应的选择。商人的价值观有时是隐而不显的，但它确实存在。商帮文化的多层次性要求我们在研究中，也应分层来进行。

其次，这个系统具有互动性。商帮文化的物质层面、制度层面、价值层面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它们共同结为一个整体生命。众所周知，商人的言语和行事总是受一定的规则制约，而之所以制订或遵守这些规则这些制度，又是受着商人价值观念的影响。反过来也是一样的，商人的价值观念不是悬空的，它必须表现在一些制度和规则上；而商帮的制度和规则也不是虚设的，它必须显现在对商

人的制约上。由此可以看出,商帮文化的三个层面是联成一气、融为一体的。商

我们将选取四个关键点来比较商帮的价值观：一是商人的自我认识比较，二是商帮的凝聚力比较，三是商人的经营理念比较，四是商人财富使用方式比较。站在这四点来看甬商、徽商、晋商，看他们如何认识自我，如何凝聚成帮，如何挣钱，如何花钱，似乎可以透视他们价值观念的五脏六腑。在比较三大商帮的经营策略和财富处置时，我们同样需要注意选点的问题。选取某些具体的点，将三大商帮文化进行细致而深入的比较，然后才能总结出三大商帮文化的异同。

当然，还应该将论题拓展开来，从商帮文化的外围来观照商帮文化。分析商帮文化的环境因素，并加以比较研究，这样会使我们更好地认识甬商、徽商、晋商的商帮文化特征。商帮文化的环境因素大约包含四个方面：地理环境、民俗环境、政治环境和学术环境。所谓商帮文化的地理环境，是指商帮原生地的地理环境。地理决定论者的观点当然不足取，但是地理环境对文化的影响确实意义深远，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即是此理。地理环境因素包括众多方面，我们不可能面面俱到。我们是站在商帮文化比较的角度，指出宁波、徽州、山西各自的地理特征，揭示它们与商帮文化的内在关联。

所谓商帮文化的民俗环境，是指商帮原生地的民俗。一个商人不管走向何方，出生地的民俗总是浸透在他的血液里，表现在他的言行中。因此，宁波、徽州、山西的民俗对于甬商、徽商、晋商文化的形成具有巨大影响。反过来，商人所带回来的财富，回乡商人的言行举止，又会对家乡民俗产生巨大的反作用。考察这两方面的相互作用，我们可以更深层地理解不同商帮文化的文化特征。

比较商帮的政治环境，主要是考察商人自我营造的政治环境。某一时段某一地区的政府政策对于所有商人来说，理论上应该都是一样的。因此，有关政府政策和制度，我们不想过多地涉及。但是，不同商人与政府及其官员的距离远近是有差别的。与政府及其官员选取怎样的距离，以何种方式来保持这种距离，接近政府及其官员要达到怎样目的，所有这些选择都受商帮文化支配。从这些角度来考察商帮的政治环境，对于我们理解商帮文化的特征应该是有益处的。

一般说来，研究学术是读书人的事。一个地区的学术研究与该地的商帮文化一样，都是直接接受当地的民俗文化影响。学术、民俗、商帮文化三者异质同构，学术常常通过民俗来影响商帮文化。一个地区的学术是该地区精英文化的代表，一个地方的精英文化总是会对当地民俗文化产生影响。一个地区的民俗常常决定着当地的商人对待学术的态度。我们将从地区学术特性、商人对学术态度、学术对商帮文化的影响等几个方面来考察甬商、徽商、晋商的学术环境。

总而言之，本书的主体分为两大部分：上篇从商帮文化的“本体”来比较甬商、徽商、晋商文化，下篇从商帮文化的“外围”来考察甬商、徽商、晋商文化。此两部分联成一体，互相印证。

上篇

商帮文化

“本体”之比较



值取向,以及价值主体对价值客体及自身的评价。价值是客观的,价值观则是主观的。由于人们的社会条件、生活经验、目的需要、兴趣爱好、情感意志等不同,因而人们的价值观也不相同。这种主体上的差异是价值观的一个重要表征。我们以下将要比较甬商、晋商、徽商的价值观,其实也是奠基于这种差异之上。

3. 商帮的价值观

价值观的主体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一个群体。像甬商、徽商、晋商这样的商帮是属于群体。一群人在一定的时空之内经商,大家认同一致的文化心理,持有共同的价值观念,遵守共同的商业道德,操用共同的商业运作模式,共同营构一种社会影响力,共同塑造一种被社会承认的商业形象。这样的群体就是商帮。一个商帮的群体表现,就是该商帮的文化。在一种商帮文化之中,商帮的价值观是最核心的内容。

要考察一个商帮的价值观,或者更进一步,要比较若干商帮的价值观,就必须弄清以下几种关系:

一是本体与表象之间的关系。商帮的价值观是“体”,它是真实存在的。一群商人能称得上商帮,必然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如果一个商帮没有内在的共同的价值观支撑,那么也就不足以称为商帮,而只是一群乌合之众而已,那么也就没有什么商帮文化可言了。但是价值观毕竟是观念性的东西,它是无形的,必须依托于一定的表象来显现。商帮的商业运作模式、商业道德、与社会交往的潜规则以及商人个人的言行等,这些都是“用”,都是用来显现价值观的表象。此两者即体即用,体用不二。理解这层关系很重要,如果就价值观来谈价值观,只会是空谈一些名词术语,玩弄一些文字游戏。我们必须在商帮的行规和商人的行事中来谈商帮的价值观。

二是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商帮是一个集合概念,它是由一群商人构成的集体。其中每一个商人可能都有自己的价值观,这是个性化的东西。商帮的价值观具有共性,是众多商人价值观的最大公约数,为商帮中大多数成员所持有,是一般性的东西。比较商帮的价值观,当然不能局限于一些个性化的案例。但是商帮的价值观又不是悬空的,它是在一个个具体商人身上体现出来的。因此,我们在考察商帮的价值观时,又不得不以具体商人的价值观作为支撑材料。这就要求我们要把握好个体与群体的辩证关系:在了解个体的基础上来把握群体,又在对群体理解的基础上来把握个体。这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将伴随我们整个研究活动的始终。

三是主要与次要之间的关系。既然价值观包括价值主体的价值取向,以及价值主体对价值客体及自身的评价,那么任何一个商帮的价值观其实都是一个价值判断的系列。这些价值判断不是一盘散沙,而是一个价值体系,共同组成了

人去知故其事 甘山以故去故心人故而心日且于西故山空 甘山七而故人告

威，他们当然不希望商人以自己的财富来轻忽他们的权威。

二是与儒家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有关。传统儒家主张修身是为人之本，修身重在舍利而求义，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商业经营不能不计较利害得失。在传统儒家学者看来，商人追逐金钱富贵，有碍于人的修身养性，所以商人遭到传统文人鄙视，被称为“商人重利轻别离”。儒家的如此主张虽然主观上不一定为当权者着想，但是客观上确实与当权者的上述心理相耦合。中国传统社会商品经济发展不充分，儒家学说需要承担一部分责任。

三是与当时低下的生产力水平有关。统治者的政治考量和儒生的意识形态，都受制于当时社会的生产力。商业的出现是为了交通有无，而交通有无必须是在出现劳动剩余产品的基础之上。在现代，商业显得这么重要，因为现代社会具有很高水平的生产力，人与人之间有大量的劳动产品需要交换。但是在中国古代，生产力低下，劳动剩余产品毕竟有限。因此，商业的发展规模自然受到限制。在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上，由于有了“农本商末”的价值观念，商业一直受到抑制，商人一直受到鄙视。商业挣的钱被认为是不干不净的，商人也被排在士农工商四民之末。

但是到了明清时期，中国社会生产力有了一定的进步，社会对商业的需求增大。尤其是国门被迫渐次打开，中国社会不得不逐渐地被拖入世界经济当中，商业越来越显示出它的重要价值。有些人顺应了这种社会发展需要，从而才会有所谓的“明清十大商帮”脱颖而出。甬商、徽商、晋商能够进入“明清十大商帮”之列，是因为他们都能突破传统文化的“农本商末”的价值框架，对商业及商人自身的价值均是采取一种正面的积极的肯定的态度。但是细细考究甬商、晋商、徽商的言行，我们还是可以发现，三大商帮的自我认识都带有各自商帮的特点。

1. 甬商——本业商人

甬商有“四民异业而同道”的观念。嘉靖四年（1525），宁波余姚著名思想家王阳明为当时一位商人方麟撰写了《节庵方公墓表》，其中谈到：“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业焉，以求尽其心。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士农以其尽心于修治具养者，而利器通货犹其士与农也。工商以其尽心于利器通货者，而修治具养犹其工与商也。故曰：四民异业而同道。……自王道熄而学术乖，人失其心，交骛于利，以相驱使，于是始有歛士而卑农，荣宦游而耻工贾，夷考其实，射时罔利有甚焉，特异其名耳。”^①研读这篇短文，至少可以理出这样几

^①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941页。